

文章编号: 1008-2786-(2018)5-774-10

DOI: 10.16089/j.cnki.1008-2786.000373

乡村旅游对山区积极老龄化的影响

——以都江堰市为例

岳 瑞^{1,2}, 李立华^{1*}, 黄茹莉¹

(1.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成都 61004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摘 要: 山区是长寿人口聚集区域,也是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区域,推动山区积极老龄化是山区发展及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本文从社会网络视角构建了积极老龄化评价指标体系,结合问卷调查数据测度了都江堰市老人积极老龄化水平,并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对积极老龄化的影响和机制。研究表明:老人及其家庭旅游参与的生计方式是影响其积极老龄化水平的关键因素,而不同的旅游开发模式是积极老龄化效果分异的主要推动力。三种开发模式中,综合开发型下的山区积极老龄化水平最高,社区主导型居中,企业主导型情况最差。因此,为推动山区积极老龄化,今后山区旅游发展应更多关注社区和农户发展的诉求。

关键词: 乡村旅游;山区;积极老龄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 F592;D669.6

文献标志码: A

山地不仅具有淡水“水塔”、生物与文化多样性、环境敏感性和休闲旅游四大价值功能^[1],其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清新的空气等还使其成为长寿人口聚集区。从世界长寿之乡来看,百岁老人大多数都生活在山区乡村^[2],并且截至 2017 年 5 月,中国 77 个长寿之乡中有 58 个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比例高达 75.32%。但同时,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山区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向城镇大量集聚,加深了我国山区特别是西部山区人口的老龄化程度,而且还伴生了“村庄空心化”“农业劳动人口老龄化”“山村贫困化”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我国山区的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目标。

为促进人类实现健康长寿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世界卫生组织相继提出了“成功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等应对策略,并于 1999 年又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指“为了提高人们在老年期的生活质量,使其健康、参与和

保障情况最优化的过程”^[3]。该概念一经提出就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王树新最先将该概念引入国内,并评价了北京市积极老龄化的效益,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对策建议^[4]。目前,国内外对积极老龄化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或辨析^[5-6]、评价指标的确定^[7],和积极老龄化影响分析^[8-9],并且研究对象几乎都为城市老人,很少将研究视角定位到边远山区老人,关于乡村旅游对山区积极老龄化的影响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与平原地区相比,山区老龄化问题更严峻、情况更复杂、程度更深。因此,推动积极老龄化,缓解山区老龄化危机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迫在眉睫。

随着全球旅游市场的快速发展,旅游资源禀赋充足,品质优良的西部山区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极大改善了山区落后的经济发展现状。作为新常态下山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旅游的开发必然会对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思想观念等产生重要影响,如大

收稿日期(Received date): 2018-04-18; 改回日期(Accepted date): 2018-09-20

基金项目(Foundation item):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071091)。[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071091)]

作者简介(Biography): 岳瑞(1993-),女,四川崇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山地旅游与山区发展。[YUE Rui(1993-),female, born in Chongzhou, Sichuan Province, M. Sc. candidate, research on mountain tourism and mountain development] E-mail: 964019802@qq.com

* 通讯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 李立华(1964-),男,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山地旅游与山区发展。[LI Lihua(1964-),male, professor, specialized in mountain tourism and mountain development] E-mail: Lilh@imde.ac.cn

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旅游发展会对农户生计方式产生巨大影响^[10-13]。但是比较而言,对作为弱势群体的乡村老年人生活影响实证研究较为少见。各地因资源基础、开发管理、产品分类、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旅游开发模式^[12,14],而开发模式不同将对山区老年人的生活特别是其积极老龄化情况产生不同影响。不同旅游开发模式下的山区积极老龄化效果对比研究及机制探析对于提高山区积极老龄化水平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都江堰市5个村落为案例点,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从社会网络视角构建积极老龄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指数法对研究区积极老龄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一步探析旅游开发模式对山区积极老龄化的影响及机理,识别推动山区积极老龄化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探索山区积极老龄化的旅游路径,为提高山地旅游综合效益提供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与旅游开发模式

都江堰市地处成都平原西北边缘,境内地质构

造复杂,跨成都平原和龙门山地两个不同自然地理单元,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在15℃左右,年降水量保持在1000毫米左右,气候宜人,是我国著名的长寿之乡。西北到东南,地势从高山、中山、低山、丘陵再到平原逐级降低,全市山地和丘陵面积占65.79%,素有“六山一水三分田”之说。区内旅游资源富集,特别是山地旅游资源,不仅资源品位较高,并且地域组合良好,特色鲜明,如享誉中外的世界遗产地、国家5A级风景区青城山。2015年都江堰市共接待游客2145.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12.75亿元。截至2015年,该市常住人口约68.02万人,其中60岁以上人口达137 613人,占总人口的20.23%,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另外,该市因较高的旅游气候舒适度以及优美的自然环境,成为许多外来城市退休老人避暑和养老的圣地,这也进一步加深了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本文选取都江堰市上元村、泊江社区、三溪村、高原新村及泰安村为典型案例区(图1,表1)。一方面这五个村落乡村旅游发展较好,涵盖了三类基本旅游开发模式,有利于研究不同开发模式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这几个村落老龄化现象较严重,是山区老龄化问题典型代表地区,对研究其他山区旅游发展与积极老龄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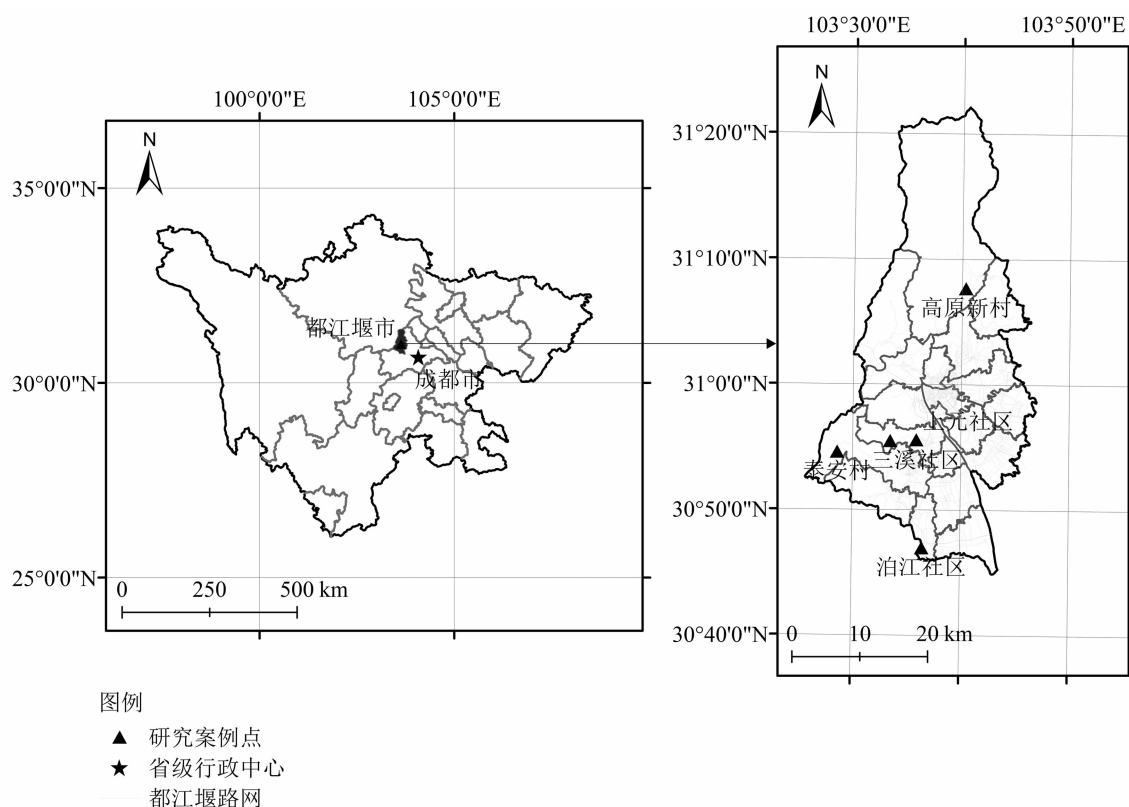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区区位示意图

Fig.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表 1 样本村/社区的基本情况
Tab. 1 Basic information of sample villages/communities

项目	上元村	三溪村	泊江社区	泰安村	高原新村
区位	市区西南面	市区西南面	市区南面	市区西南面	市区东北面
面积/km ²	8.5	9.2	27.6	40	40
户籍人口/人	3150	916	1708	1398	935
60 岁以上人口 比重/%	19.52	21.72	27.34	26.45	18.82
乡村旅游开发模式	企业主导型	社区主导型	社区主导型	社区主导型	综合发展型
乡村旅游资源	青城道茶生态山 庄、茶山	王婆崖、小九寨、孟江河	海棠公园	泰安古镇、青城后山	虹口自然保护区、虹 口漂流、高原河谷国 际山地户外体验营
乡村旅游发展情况	日均接待游客 300 人次以上,累 计实现乡村旅游 收入 72 万元。	现有农家乐 70 余家,旅 游旺季期间全社区旅游 接待活动纯利润可达 200 多万。	去年旺季期间吸引游 客 120 万余人次,带动 周边 37 户农户从事农 家乐经营活动,户均增 3 万余元纯收益。	当前景区内外共有 农家乐 200 余家,去 年旅游人次达 120 万人次,收入 2400 万元。	旺季期间该村日均接 待游客量可达 1000 人 次。

关系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本文根据企业、政府、农户三方相关利益主体在乡村旅游开发和管理运营中的主导地位不同,将样本村落/社区的旅游开发模式分为企业主导型、社区主导型和综合开发型三种基本类型(表 1)。企业主导型是指乡村旅游的开发主要由企业主导,企业掌握着开发运营管理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而农户则处于边缘位置,既缺乏对乡村旅游的话语权,又很难从旅游发展中获取利益;社区主导型是指乡村旅游的开发主要由社区政府或农户主导,这种开发模式下的乡村旅游会兼顾社区发展和农户利益等问题,使农户在旅游参与中掌握着话语权和主导权;综合开发型是在社区主导型的基础上引入旅游管理公司对乡村旅游开发进行市场化运营管理,既兼顾了社区发展、农户利益等问题,保障了对旅游开发的有效运营。

1.2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调查问卷。考虑到各村镇经济社会发展、旅游发展以及乡村老龄化的情况等因素,在都江堰市旅游局乡村旅游工作组工作人员推荐下,研究选取了 4 个样本乡镇,采取分层比例抽样的方法确定了 5 个案例地。并于 2017 年 12 月初,采取随机入户的方式开展了为期一周的调研和访谈。调研组共发放问卷 217 份,回收有效问卷 196 份,有效回收率达 90%。调查内容主要包括:①山区老人及其家庭基本情况,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

状况、居住情况、家庭生计状况等;②乡村老人积极老龄化的情况。

研究所需的其他数据主要从相关政府部门获得。其中,都江堰市人口老龄化数据从民政局获取;各样本村落人口情况,特别是老年人口情况、经济发展基本情况、旅游发展现状及开发模式等从各村委会获取;从景区管理局等获取当地旅游总体发展情况数据。

2 研究方法

2.1 积极老龄化评价指标体系与测度方法

2.1.1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积极老龄化在政治策略上的解读更多,而在个人层面上,学界一直对其概念和定义缺乏共识,所以还未形成理论上的测度指标体系。从社会网络视角来看,个人老龄化的实质是其生命力与社会网络关系(影响力)下降的过程,而积极老龄化是以提高老年人生命质量,使其在晚年保持健康、独立并促进老年人继续对社会做出贡献为最终目标的人口策略,独立性和影响力是其关键构成要素。独立性指老年人不依赖他人而进行独立生活的条件,因此健康的身心状况是他们保持独立性的重要前提。其次,经济状况也是衡量老年人独立性的重要指标,因为经济收入是维持后期生活中基本需求所必需的^[15],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与世卫

组织所强调的应把老年人的身体和经济安全考虑在内是一致的^[16]。从社会网络视角看,当人进入老年期后,尤其是从生产劳动中退出后,随着身体状况的日益退化,会与社会之间发生不可避免的相互撤退或脱离。因此,要实现积极老龄化,不仅需要老年人保持独立性,更需要维护和扩展他们的社会网络关系(影响力)。因为工作是一个关系平台,再就业是维护老年人社会网络关系的很好方式,并能促进老年人从社会资源消费者向社会资料再生生产者转变,有助他们实现经济上的独立。此外,社会参与也是老年人建立和维持其社会网络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

因此,本文在参考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7,17-18],从社会网络理论视角,构建了积极老龄化的“独立性-影响力”评估框架,从良好的身体机能、健康的心理状态、良好的经济状况、积极的社会参与和就业五个维度建立了积极老龄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借助相关研究成果遴选出 24 个二级指标测度乡村老人积极老龄化水平(表 2)。

2.1.2 综合指数法

本研究采用综合指数法评价积极老龄化水平。综合指数法是指将不同量纲的评价指标体系综合成一个综合评价指数的方法,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 指标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表 2 乡村老人积极老龄化测度指标基本情况及权重

Tab. 2 The basic conditions and weights of rural elderly active aging indicators

维度	指标	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权重
身体健康状况	自评健康	非常差到非常好依次赋值 1~5	3.214	0.906	0.004
心理健康状况	精神状况		2.607	0.759	0.008
	乐观程度		2.714	0.662	0.005
	对衰老的看法	感觉不好 = 1, 感觉一般 = 2, 感觉好 = 3	2.633	0.713	0.007
	孤独感		2.796	0.524	0.003
	自我效能缺失感		2.776	0.535	0.003
社会参与状况	社区治安维护		1.117	0.393	0.100
	维护交通秩序		1.174	0.474	0.085
	文明劝导		1.520	0.785	0.047
	环境保护		1.755	0.893	0.034
	协助或指导社区文体活动等的开展		1.117	0.406	0.102
	某些活动的志愿者		1.102	0.378	0.107
	打麻将或其他棋牌		1.658	0.776	0.033
	锻炼身体	从不参加 = 1, 偶尔参加 = 2, 经常参加 = 3	2.240	0.844	0.014
	唱歌跳舞		1.230	0.574	0.079
	与亲友聚会(聊天逛街)		2.475	0.785	0.009
	外出旅游		1.566	0.715	0.036
	关心村/社区事务		1.821	0.928	0.033
	参与村委会或社区居委会评议活动		1.561	0.729	0.038
	参与社区组织的政策知识学习宣传或讨论		1.240	0.579	0.076
	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		1.168	0.522	0.095
	为社区本地的发展提供建议		1.347	0.616	0.056
就业状况	是否就业	是 = 1, 否 = 0	0.663	0.473	0.017
经济状况	自评经济水平	困难 = 1, 一般 = 2, 宽裕 = 3	1.934	0.554	0.010

由于各评价指标存在量纲和数量级上的差异,需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消除其对数据分析结果造成的偏差。本文选取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即:

$$X'_{ij} = \frac{X_{ij} - X_{jmin}}{X_{jmax} - X_{jmin}} \quad (i = 1, 2, 3 \cdots n; j = 1, 2, 3 \cdots m) \quad (1)$$

其中, X_{ij} 为第 j 项评价指标下第 i 个对象的原始评价价值, X_{jmin} 和 X_{jmax} 为第 j 项评价指标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而 X'_{ij} 则为处理后的标准化值。

(2) 计算各指标权重

本文评价指标变量较多, 为获得客观评价结果, 采用客观赋权的熵值法来确定各指标权重, 熵值法计算权重其可信度较高且能有效克服指标间信息重叠^[19], 篇幅所限, 其具体步骤在此省略。

(3) 计算各评价对象的综合得分:

$$S_{ij} = W_{ij} \times X'_{ij} \quad (2)$$

其中, S_{ij} 是第 j 项评价指标下第 i 个对象的得分, W_j 是第 j 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在确定每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和评价得分后, 通过加总各维度的得分即可得到老人积极老龄化综合得分。积极老龄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统计情况及权重见表 2。

2.2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为分析不同旅游开发模式对山区老人积极老龄化水平的影响, 本文将积极老龄化综合指数作为因变量, 旅游开发模式作为自变量, 将老人个体的人口学特征因素、家庭经济情况及区位条件等设置为控制变量, 利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其计量经济模型方程如下:

$$Y = \beta_0 + \beta_1 \times \text{开发模式} + \beta_2 \times \text{旅游参与} + \beta_3 \times \text{控制变量} + \mu$$

式中, Y 表示受访老人积极老龄化综合指数得分, β_i 为模型待估参数, μ 为模型残差。

为进一步探索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对积极老龄化影响的内部作用机制, 本文将引入老人、老人家庭旅游参与的生计方式两个变量作为中介变量。因为旅游的发展会对山区老人生活方方面面产生深刻影响, 其家庭生计方式的选择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老人积极老龄化水平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综合指数, 山区老人参与旅游业和其家庭生计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对他们积极老龄化结果产生影响。若这两变量分别能对老人积极老龄化水平产生直接影响, 并对它们进行控制后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对整体积极老龄化影响变得不显著或回归系数发生较大改变,

则说明它们是旅游开发模式对山区积极老龄化水平产生作用的关键机制。

3 结果与分析

3.1 研究区积极老龄化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3.1.1 问卷信度检验

在对调查问卷结果进行分析前需要对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以确保调查问卷结果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本文利用 SPSS22 数据分析工具 scale 模块下的 reliability analysis 工具对问卷进行信度分析, 结果表明问卷整体信度的 Cronbach 值为 0.795, 显示了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3.1.2 各样本村/社区积极老龄化对比分析

根据综合指数法计算得知样本总积极老龄化水平偏低, 并且样本村落/社区积极老龄化水平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图 2), 高原新村得分最高, 其积极老龄化综合指数得分均值为 23.285, 泊江社区次之, 其平均得分为 20.744, 剩下的三溪村和泰安村的得分分别为 19.201 和 16.378, 上元村得分均值最低, 只有 13.430 分, 比高原新村均值低了近 10 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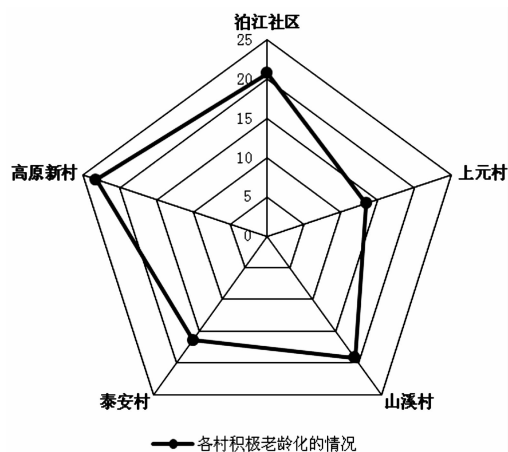


图2 样本山区村落积极老龄化的情况

Fig. 2 The situation of active aging of sample villages/communities

图3显示了各样本村落/社区积极老龄化子维度综合得分的情况。就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和经济水平而言, 各村落差异较小, 但社会参与和就业差异较大。泊江社区和高原新村社会参与维度得分最高, 上元村得分最低。从社会参与维度看, 泊江社区和高原新村被调查老人在社会参与各个子类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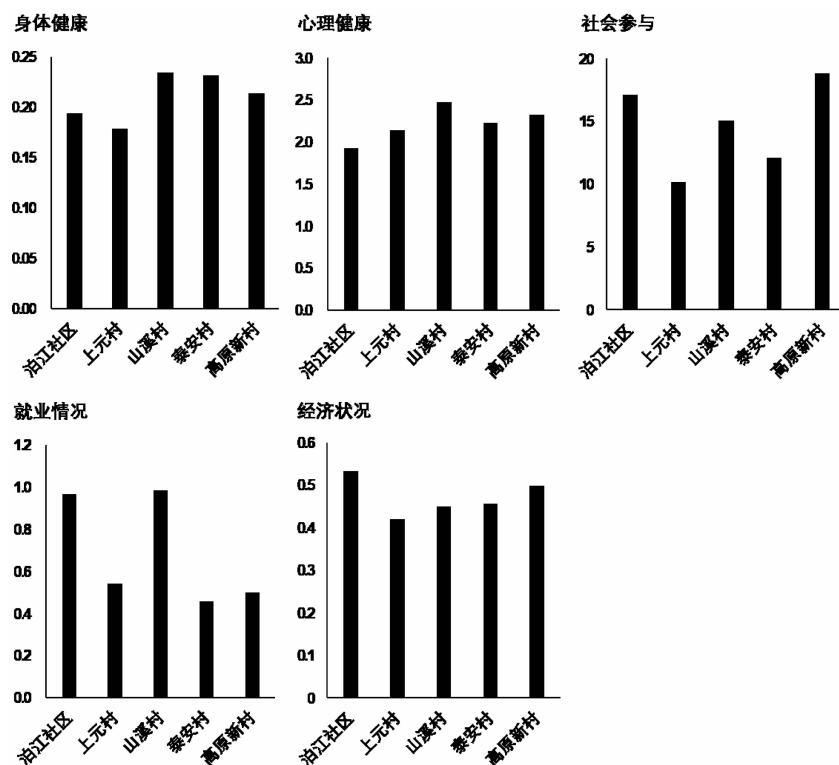


图3 各样本村/社区积极老龄化各子维度的得分情况

Fig. 3 The score of sub dimensions of active aging in each sample village/community

的得分情况都较好,泊江社区主要是志愿类活动得分高于其他村,这可能与泊江社区很多老人都有志愿经验有关。高原新村政治类活动参与情况得分远高于其他村落/社区,而这可能与高原新村政府领导有关。上元村社会参与各个子类别得分都较低,特别是志愿类活动和文体类活动该村被调查老人参与度都是整个样本中最低一组(图4),是最不积极的社区。

从就业维度来看,高原新村、泰安村得分显著高于三溪村、泊江社区和上元村。出现这种差异可能是高原新村、泰安村乡村旅游业发展较好,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且对体力要求不高,旅游业可充分吸收

山区老年劳动力,不管向游客销售土特产、当导游,或是在家庭、邻里或亲友的农家乐、餐馆等当帮工都可以实现他们的再就业。对于同样是旅游业发展较好的三溪村,该区就业维度整体得分不高可能与其地理环境有关,因该村处于山区,平地有限,农家乐大都分布在公路沿线,数量有限,能吸收的老年劳动力有限,加上被访老人中还有许多住在远离公路高山区,社会隔绝程度较高,大部分老人除了从事三木药材或农产品种植外,很难找到其他有经济收入的活动。而上元村因被企业垄断经营,大部分老人很少从事除种田外其他有经济收入的活动。泊江社区由于并未形成稳定的、规模化产业链,多数老人除种植海棠、桂花等经济树种或农副产品外,较少从事其他有经济收入的活动。

3.2 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对山区老人积极老龄化影响及机制分析

3.2.1 乡村旅游开发模式与山区老人积极老龄化的回归结果

旅游开发模式对乡村老人积极老龄化的计量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首先以控制变量为自变量(见模型1),分析结果表明家住旅游核心游览区或旅游公路附近有利于山区老人实现积极老龄化;在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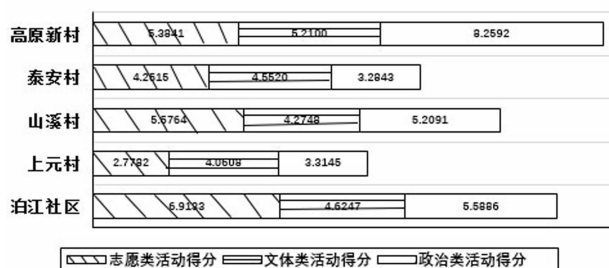


图4 各样本村/社区社会参与子维度得分

Fig. 4 The score of sub dimension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each sample village/community

的居住安排中,与老伴或子辈同住也会对山区老人积极老龄化水平带来显著正面影响,说明与家人一起居住的老人,其积极老龄化表现更好;在文化程度方面,初中以上学历老年人其整体积极老龄化水平要高于小学学历或文盲老人,可能是因为文化程度越高的老人越有积极老龄化意识;此外,老人的性别、个人收入、年龄、家庭收入等其他变量与山区老人积极老龄化水平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整个模型的判定系数为 0.153。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了乡村旅游不同开发模式作为自变量,此时模型 2 的解释力增加到了 18.5%,相比模型 1 提升了 3.2%,表明乡村旅游的开发模式是影响山区老人积极老龄化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在 $p < 0.05$ 的水平上,相较于社区主导型的开发模式,企业主导型与山区老人积极老龄化水平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企业主导型不利于山区老人实现积极老龄化,而在 $p < 0.1$ 的显著性

水平下,综合开发型模式与研究区老人积极老龄化水平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多元参与主体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对山区老人总体积极老龄化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大。

3.2.2 老人及其家庭旅游参与生计方式的中介作用
为辨别不同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对研究区积极老龄化水平影响的逻辑关系,本文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分别引入老人、老人家庭旅游参与的生计方式两个中介变量构建了模型 3 和模型 4(见表 3)。模型 3 回归结果表明在 $p <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上,老年人自己参与旅游业对其积极老龄化水平的回归系数为 7.423,影响显著,且旅游开发模式中的企业主导型和综合开发型对研究区积极老龄化的回归系数绝对值从模型 2 的 5.508 和 3.316 下降到了 2.477 和 2.75,特别是综合开发型的影响不仅变小还变得不显著了。模型 4 的回归结果表明,相较于非旅游经营户家庭,家庭从事旅游经营活动与山区老人积极

表 3 乡村旅游开发模式与老人积极老龄化的回归结果

Tab. 3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 with active aging of the elderly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性别 a	3.026 (2.072)	2.543 (2.053)	3.143 (2.007)	2.726 (2.036)
区位条件 b	4.956 ** (2.204)	3.838 * (2.218)	3.247 (2.167)	2.972 (2.224)
婚姻状态 c	4.798 * (2.698)	5.725 ** (2.718)	5.331 ** (2.649)	4.632 * (2.690)
居住方式 d	1.302 * (3.143)	1.055 (3.222)	1.028 (3.137)	1.386 * (3.221)
文化水平 e				
小学	1.297 (2.330)	0.906 (2.313)	1.065 (2.253)	0.59 (2.276)
初中	8.203 *** (3.128)	8.636 *** (3.095)	8.395 *** (3.014)	8.476 *** (3.031)
高中/中专及以上	8.053 * (4.216)	7.256 (4.147)	10.523 * (4.066)	6.425 (4.038)
年龄 f				
年龄 = 70 ~ 80 岁	-1.222 (2.230)	-0.801 (2.216)	-0.366 (2.162)	-0.998 (2.221)
年龄 = 80 岁及以上	-6.521 (4.779)	-6.295 (4.716)	-2.976 (4.701)	-8.095 * (4.715)
家庭月收入	0.092 (0.202)	0.009 (0.201)	-0.055 (0.197)	0.023 (0.201)
开发方式 g				
企业主导型		-5.508 ** (2.826)	-2.477 * (2.901)	-2.313 (3.063)
综合开发型		3.316 * (2.506)	2.75 (2.446)	4.561 * (2.660)
老人自己是否参与旅游业 h			7.423 *** (2.250)	
家庭旅游参与情况 i				
部分参与				6.887 ** (3.058)
完全参与				2.868 * (2.442)
常数	4.962 (3.773)	5.554 (3.746)	1.746 (3.826)	3.357 (3.825)
R ²	0.153	0.185	0.231	0.209

注:非标准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参照组 a 男性, b 家住旅游核心游览区或旅游公路附近, c 已婚, d 非独居, e 文盲, f 60 ~ 70 岁, g 社区主导型, h 自己参与旅游业, i 家庭完全没有参与旅游业, * $p < 0.1$, ** $p < 0.05$, *** $p < 0.01$

老龄化水平呈现了较为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且旅游开发模式中的企业主导型对积极老龄化回归系数的绝对值从 5.508 下降到了 2.313,而综合开发型的回归系数由模型 2 的 3.316 上升到 4.561,其影响作用变得更为显著了。由此可见,老人及其家庭旅游参与的生计方式在旅游开发模式对山区积极老龄化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可部分解释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对山区老人积极老龄化的影响作用。

3.2.3 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对山区老人积极老龄化的影响机理

(1) 老人及其家庭旅游参与的生计方式是影响研究区老人积极老龄化水平分异的关键因素

老人从事与旅游业有关的经济活动,不仅可以实现山区老人再就业,提高老人的经济独立性,而且根据社会网络理论,乡村老人从事旅游业能增加他们与不同游客交往的机会,扩大他们的人际关系网络,进一步减少他们的孤独感,从而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另外人际关系网络的扩大会使老人拥有更多物质和智力资源,这会促使他们继续寻找新的关系和社会参与形式^[20],实现农村老人社会网络构建与社会参与的良性循环,从而促进乡村老人实现积极老龄化。

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农业用地的减少以及政府对旅游经营活动的鼓励等外部环境变化会引起农户生计方式的转型,而山区老人家庭生计方式发生变化又必然会对其生活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积极老龄化水平。与非旅游生计型的家庭相比,生计方式与旅游业有关的农户,其家庭内的老人或多或少也会参与到旅游经营活动之中,并且家庭旅游参与的生计方式,可以使年轻人就地就业,老人能充分得到家庭方面情感支持,有效减轻其孤寂感。另外子女和老人不用分居两地,减少了乡村老人的日常开销,这对老人尤其是身体状况较差而不能从事生产活动的老人而言非常重要,大大降低了他们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最后因旅游发展而增加的家庭收入也可改善老人的经济状况,所以家庭旅游参与的生计方式对提高山区老人积极老龄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2) 不同旅游开发模式是山区整体积极老龄化效果分异的主要推动力

从区域层面来看,山区老人自己与其家庭旅游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主要受不同旅游开发模式影响。企业主导的开发模式下,开发企业更多的是考虑自

身经济收益,很少会考虑社区发展需求和农户利益的问题。如上元村的“青城道茶生态观光园”通过政府从农村集体和农户个体获取土地及相关旅游资源来打造旅游产业景区,仅以少量租金补偿失地农户。由于大部分农户缺乏管理经验或资金实力,很难参与到旅游接待活动中去,乡村老人更是被排除在旅游接待活动之外。这种情况下,农户的利益被剥离在乡村旅游这个圈层之外,加剧了传统农业与旅游业、居民与投资商、居民与游客、甚至是居民内部之间的矛盾,破坏了乡村的和谐^[21]。并且失去传统生计赖以生存之土地的村民,为了生计不得不远走他乡,不仅再次使留守山村的老人成为空巢老人,恶化其生活环境和条件,还使山区陷入新一轮老龄化困境。

而以社区或农户参与为主导开发模式下的三溪村、泊江社区、泰安村和高原新村,这些村落在旅游市场发展的驱动下,农户自发或在村委会的引领下,利用当地自然生态、人文资源,积极开展旅游接待活动,并由当地政府对旅游发展进行监督和管理,大大增加了农户参与旅游经营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这种情形下村民们利用自家屋宇房舍、土地等有形资产积极开展旅游接待活动,乡村老人们或多或少可以参与其中。其中,高原新村更是创新采用鼓励当地农户以重建新房中闲置房间入股并成立专门旅游管理公司进行市场化运营来共同打造高端家庭度假型酒店的开发模式^[22],积极引导山区农户参与旅游业,既充分考虑了农户利益、社区发展的问题,还有效解决了失地农户的生计问题,并对山区老人积极老龄化产生显著促进作用。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对研究区老龄化水平的影响机理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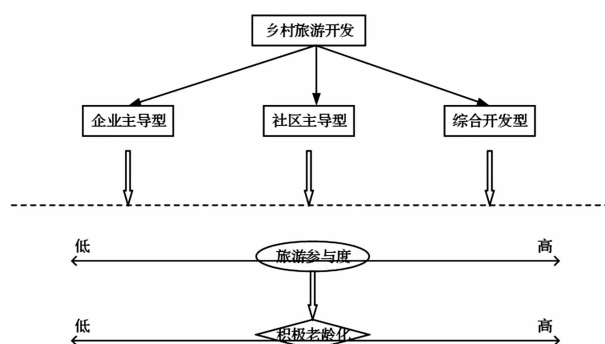


图 5 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对山区积极老龄化水平的影响机理

Fig. 5 The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 on the active aging of mountain area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与建议

(1)通过构建山区老人积极老龄化评价指标体系来综合评价研究区积极老龄化水平。评价结果显示研究区总积极老龄化水平偏低并呈现异质异构的空间格局。

(2)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老人及其家庭旅游参与的生计方式是山区积极老龄化水平分异的关键影响因素,而受不同旅游开发模式影响,村民旅游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会有不同,从而影响到山区整体积极老龄化水平。

(3)不同旅游开发模式对山区老人积极老龄化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性,对积极老龄化最有利的是综合开发模式,其次是社区主导模式,最后是企业主导模式。

因此,今后山区旅游发展应更多关注社区和农户发展的诉求。强调经济效益同时也应注重把促进包括老人在内所有村民的福祉纳为发展目标,加大对农户的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经营旅游业的能力,增加他们参与旅游经营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这样旅游业才能真正地发挥推动山区发展和振兴乡村的作用,山地旅游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4.2 讨论

作为较早发展乡村旅游的典型区域,都江堰市受到了学界诸多关注,过去乡村旅游影响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农户生计、旅游营销等问题上,本文的研究结果无疑会丰富都江堰市乡村旅游的研究内容。

尽管积极老龄化受到了学界较多关注,但国内多数研究都停留在概念辨析上,实证研究较少。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多表明社会参与是积极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维度,而本文的研究结果恰好相反。说明不同文化背景下,积极老龄化的侧重点应有所区别,而不应以统一的标准来衡量。

乡村旅游的发展不仅能增加山区老人与不同游客交往的机会,扩大他们的人际关系网络,进一步减少他们的孤独感,促进他们实现身心健康,还能帮助乡村老年人再就业,有助他们实现经济上的独立,提高其生活水平和影响力,对推进山区积极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MARTIN F. PRICE, EUI-GYEONG K. Priorities for sustainable mountain development in Europ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World Ecology*, 1999, 6(3): 203 - 219
- [2] 马婧婧, 曾菊新. 中国乡村长寿现象与人居环境研究——以湖北钟祥为例[J]. *地理研究*, 2012, 31(3): 450 - 460 [MA Jingjing, ZENG Juxin. Study on the longevity phenomena and human settlements in rural China: Taking Zhongxiang city as an example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2, 31(3): 450 - 460]
- [3] WHO. Active aging, a policy framework [J]. Geneva, Switzerl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28 - 42
- [4] 王树新. 北京市人口老龄化与积极老龄化[J], 人口与经济, 2003, (4): 1 - 7 [WANG Shuxin. Population aging and active aging in Beijing [J]. *Population & Economics*, 2003, (4): 1 - 7]
- [5] FOSTER L, WALKER A. Active and successful aging: A European policy perspective [J]. *The Gerontologist*, 2014, 55(1): 83 - 90
- [6] 郭爱妹, 石盈. “积极老龄化”: 一种社会建构论观点[J]. *江海学刊*, 2006, (5): 124 - 128 [GUO Aimei, SHI Ying. "Active aging": A social 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 [J].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2006, (5): 124 - 128]
- [7] FERNÁNDEZ-BALLESTROS R, ROBINE J M, WALKER A, et al. Active aging: a global goal [J]. *Current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Research*, 2013: 1 - 4
- [8] WOO J, NG S H, CHONG A M L, et al. Contribution of lifestyle to positive ageing in Hong Kong [J]. *Ageing International*, 2008, 32(4): 269
- [9] HAYS T, BRIGHT R, MINICHELLO V. The contribution of music to positive aging: a review [J]. *Journal of Aging and Identity*, 2002, 7(3): 165 - 175
- [10] LIU J, ZHU J, LIN C, et al. Farming versus tourism: The case of a World Heritage Site in China [J]. *Tourism Economics*, 2017, 23(8): 1581 - 1590.
- [11] 崔晓明, 陈佳, 杨新军. 乡村旅游影响下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以秦巴山区安康市为例[J], *山地学报*, 2017, 35(1): 85 - 94 [CUI Xiaoming, CHEN Jia, YANG Xinjun.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mpacted by rural tourism—A case study of Ankang in Qinling and Bashan mountainous areas [J]. *Mountain Research*, 2017, 35(1): 85 - 94]
- [12] 陈佳, 张丽琼, 杨新军, 等. 乡村旅游开发对农户生计和社区旅游效应的影响——旅游开发模式视角的案例实证[J], *地理研究*, 2017, 36(9): 1709 - 1724 [CHEN Jia, ZHANG Liqiong, YANG Xinjun, et al.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changes of households' livelihood and community tourism effect: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9): 1709 - 1724]
- [13] 贺爱琳, 杨新军, 陈佳, 等.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秦岭北麓乡村旅游地为例[J], *经济地理*, 2014, 34(12): 174 - 201 [HE Ailin, YANG Xinjun, CHEN Jia, et al. Impact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on farmer's livelihoods - A case study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northern slope of Qinling mountains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12): 174 - 201]
- [14] 张树民, 钟林生, 王灵恩. 基于旅游系统理论的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探讨[J], *地理研究*, 2012, 31(11): 2094 - 2103 [ZHANG Shumin, ZHONG Linsheng, WANG Ling'en. Research on

- development model of China's rural tourism based on tourism system theory[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2, **31**(11):2094–2103]
- [15] CHO J. Successful aging and developmental adaptation of oldest-old adults[J]. 2011;1–128
- [16] BÉLANGER E, AHMED T, FILIATRAULT J, et al. An empirical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models of active aging in Canada: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in aging study[J]. *The Gerontologist*, 2015, **57**(2): 197–205
- [17] LIN W I, CHEN M L, CHENG J C. The promotion of active aging in Taiwan[J]. *Ageing International*, 2014, **39**(2):81–96
- [18] AMADO C A F, SÃO JOSÉ J M S, SANTOS S P. Measuring active ageing: 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approach [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6, **255**(1):207–223
- [19] 陈佳, 杨新军, 王子侨, 等. 乡村旅游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及影响机理——基于秦岭景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J], *旅游学刊*, 2015, **30**(3):64–75 [CHEN Jia, YANG Xinjun, WANG Ziqiao, et al. Vulnerability and influence mechanisms of rural tourism socio-ecological systems: a household survey in China's Qinling mountain area[J]. *Tourism Tribune*, 2015, **30**(3):64–75]
- [20] SINGH A, MISRA N. Loneliness, depression and sociability in old age[J]. *Industrial Psychiatry Journal*, 2009, **18**(1):51
- [21] 尤海涛, 马波, 陈磊. 乡村旅游的本质回归: 乡村性的认知与保护[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 **22**(9):158–162 [YOU Haitao, MA Bo, CHEN Lei. Essence exploration of rural tourism: rurality cognizance and protection[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 Environment*, 2012, **22**(9):158–162]
- [22] 练建华. 生态旅游背景下乡村连锁酒店经营模式研究——以都江堰熊猫驿站为例[J], *党政研究*, 2013(4):101–105 [LIAN Jianhua. A study on the management mode of rural hotel chains in the context of ecotourism—A case study of Dujiangyan panda station[J]. *Studies on Party and Government*, 2013(4):101–105]

The Impact of Rural Tourism on the Active Aging in Mountain Areas —A Case Study of Dujiangyan City, China

YUE Rui^{1, 2}, LI Lihua^{1*}, HUANG Jiali¹

(1. *Institute of Mountain Hazards and Environ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engdu 610041, China;*

2. *Universit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Mountainous regions are the areas where people have long lifespans, but with severe aging problem. Promoting the active aging in mountainous areas is important in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ommunity and to rejuvenate rural areas. In this research, an active aging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as constr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 and it measured the active aging of the elderly in Dujiangyan City 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s on active aging were evaluated by using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tourism related to livelihood activities of the elderly people and their families were the key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level of active aging of the elderly people in the study area. (2) Different developing modes of tourism were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of differentiating effects of active aging; (3) Among the three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mode played the most positive role in the active aging of rural elderly people. In order to promote active aging in mountain areas, more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to the development demands of the communities and farmers.

Key words: rural tourism; mountain areas; active aging; impact